

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

宋五好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BKQJ-0001)

资助出版

河南大学博士后科研基金

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

宋五好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JC15N11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 / 宋五好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 11
ISBN 978-7-5613-8294-3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家庭道德—研究—中国
IV. ①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7750 号

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

ZHONGGUO RENLUN DEYU SIXIANG BIANQIAN YANJIU

宋五好 著

策划编辑 / 钱 栩
责任编辑 / 杜世雄 钱 栩
责任校对 / 曹克瑜
封面设计 / 负 巍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312 千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8294-3
定 价 /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26 85303622(传真)

序 一

宋五好博士的《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是在她博士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一部佳作。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在感到由衷高兴之时，自然也应该说点与学术有关的话，想为学生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一点建议。

首先想到的是“之所以明人伦”这样一个命题，最早是在《孟子·滕文公上》一书中提出来的。孟子在叙述中国上古时期有关学校教育的传说时讲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虽然“三代”之学名称各异、类型多样，但所学内容“皆以明人伦”。自孟子提出这个命题之后，“明人伦”不仅是贯穿中国教育几千年“立德树人”的主题，而且由此命题而生成的人伦文化也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关键的基因。

孟子之所以提出“皆所以明人伦”的命题，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密不可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要比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纷乱更甚。如果说孔子还是希望诸侯之间无论怎样强国霸主，但都应能够尊崇中央天子的周室周王而施以仁政，恢复以周礼为核心的王道精神；那么，孟子虽然绝对服膺孔子的传承，但面对中央天子周室周王的形存实亡，已不同于孔子所处的时代，世易时移所造成的“诸侯强国可能取周室而代之”的趋势，使他不能再以尊崇周室作为施以仁政的核心，而是专心于如何使有可能取代周室的强国能够拨乱世而返仁政之正道，救斯民斯世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形成的。为此，孟子曾经游于齐、梁、宋、邹、滕等之间，张扬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精神，“六十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见谭贞默《孟子编年略》）。

孟子是邹国人，当然在邹国时间最长，邹国和滕国都是鲁国旁边的小

国，滕国在邹国与鲁国之间，孟子应当先后与滕文公见过三次。第一次是滕文公为世子时，“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第二次是滕文公由楚国返回、有疑问时，“世子自楚返，复见孟子”，“世子疑吾言”；第三次是滕文公继位之后，孟子教导文公何以治天下，“皆所以明人伦”的论述就在《孟子·滕文公上》的第三则。滕文公继位之后向孟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然后告诉文公：老百姓中形成这样的一条准则，有固定产业的人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没有固定产业的就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如果没有稳定不变的思想，那么违礼乱法、为非作歹的事，就没有不去干的了。等到他们陷入犯罪的泥坑，然后便用刑罚处置他们，这就像是布下罗网陷害百姓。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却干陷害百姓的事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节俭，以礼对待臣下，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制度。孟子接着通过比较夏商周在赋税上所分别采取的“贡法”“助法”“彻法”，告诉文公：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取平均数作为常数，按常数收税。丰年，粮食多得狼藉满地，多征些粮不算暴虐。贡法却征收得少，荒年时即使把落在田里的粮粒扫起来凑数，也不够交税的，而贡法却非要足数征收。国君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一年到头劳累不堪，结果还不能养活父母，还得靠借贷来补足赋税，使得老人孩子四处流亡，死在沟壑，这样的国君哪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做官的是世代享受俸禄，滕国本来就实行了“彻”法。“彻”是“通”的意思，何不再实行助法，使百姓也得到好处呢？《诗经》上说：“雨先下到我们的公田里，接着也下到我们的私田里。”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就是周朝也实行助法的。正是在分析比较了如何让老百姓得到好处的前提下，孟子才提出了如何教化天下的问题，要设立庠、序、学、校来教导百姓。“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习射的意思。夏代主要称“校”，商代主要称“序”，周代主要称“庠”，“学”则三代共用这个名称。这些学校都是用来教人明白人伦道理的，并提醒文公，只有在上位的人明白了人伦道理，百姓在下自然就会相亲相爱。您要这么做了，如果有圣王出现，必然会来效法的，这样就成了圣王的老师了。《诗经》上说：岐周虽是古老的诸侯国，却新接受了天命。这讲的是文王。您努力实行吧，也以此来更新您的国家。

孟子提出“皆所以明人伦”的命题,首先是建立在使百姓得到更多好处的前提下的,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一种反映。在百姓获得物质幸福之下,还必须进行人伦教化,三代以来设学校都是为了明人伦。但这样还是不够的,只有君王和上位的人明白了人伦道理,做出示范,百姓自然就会效法,自然就能得到治理天下的天命。如果说孟子治理天下的思想是以民本为逻辑归宿的,那么“明人伦”便是其逻辑起点,并且把人伦教化和统治阶级的人伦道德示范作为实现整个社会“明人伦”的根本保证。

为什么要明人伦呢?因为孟子是主张性善的,他的性善论是以善为性论,是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融合在一起而阐述其性善论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这是事实判断,但“不谓性也”,君子并不把其看作性,同“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一样都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思考。虽然仁义礼智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命的限制,但君子不谓命,核心不在于性为什么是善的,而在于人是否有善性存在和为什么要把善看作性。正因为孟子把善看作性,并始终认为人存在着善性,所以才把人伦当作人的“善性”存在,把人伦教化当作培养人的善性的发端。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培养人的善性过程中,孟子把他的民本思想贯彻其中,从而强调了君子、统治者人伦示范的影响力。单从孟子与滕文公的交往来看,滕文公的父亲滕定公死了之后,文公承袭继位,于是派他的大夫然友去向孟子请教父丧之大礼。“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也。’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斋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说滕世子问题提得很好,对于父母之丧,按照孝心的初衷去做就很好,三年之孝是三代共之的古礼。当然友向滕世子做了汇报,滕世子决定实行三年丧礼时,宗室百官却以鲁国先君没有实行过这样的丧礼为由而表达出不愿意,于是然友再次到邹国请教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返国后做了汇报,滕世子说:“对,这的确在于我自己。”于是滕世子五个月都住在丧庐里,没有发布过政令诚

示。百官和同族的人都赞同,认为太子知礼。到了安葬那天,各地的人都来观看葬礼,太子面容悲戚,哭声哀伤,使吊丧的人非常满意。其实,孟子还曾举例齐桓公死后儿子们只顾争权,根本没办丧事,致使齐桓公的尸体都腐烂发臭、生出蛆虫,以告诫滕世子要通过父丧的人伦示范把社会风气扭转过来。《孟子·梁惠王下》曾经记载过邹国与鲁国一次争斗,邹国的官吏被打死30多人,而邹国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为此,滕穆公向孟子请教百姓为什么不爱国,孟子认为官吏甚至君主都不能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邹国的官吏缺乏仁爱之心、不顾百姓死活,现在得到的是报应,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可见,孟子不仅把人的善性存在置于人伦之中,还把对人的善性培养置于人伦教化之过程,而且把对君子、君王、官吏的善性开发和示范也置于人伦及其教化之中。明人伦的目的正是为了形成仁政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孟子还把明人伦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概括其“三辨之学”中通过“人禽之辨”而阐发仁义论、性善论的关键所在。滕定公三年之丧后,滕文公正式即位,派由宋国慕名而来的陈相向孟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孟子阐发了社会分工与劳力和劳心这种通行天下的道理,并在讲到“后稷教百姓耕种收获,种植五谷,五谷成熟了才能养育百姓”时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他认为人有自身的特点,若仅吃饱穿暖、安居而没有教养,就与禽兽差不多。圣人正是为此而担忧,所以才任命契为司徒,用人伦教导民众,使父子有亲情,君臣有道义,夫妇有差别,长幼有次序,朋友有诚信。当代著名教育家涂又光先生在诠释时认为,“亲”“义”“别”“序”“信”都不是单方面的,父慈子孝才是“亲”,君明臣忠才是“义”,夫扶妇服才是“别”,爱幼尊长才是“序”,互相真诚有信才为“朋”,这既是人伦平衡之理,同样也是强者示范在先、弱者效法在后的道德规范。孟子虽然在此章第四篇中并没有直接就“治于人”这样一个政治问题展开讨论,也没有直接回答什么人才有资格成为“治人者”,而是在其他地方通过“选贤与能”“民本”“仁政”做出讨论和说明;但最起码涉及了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治人”,即“教以人伦”。如果不能使人明人伦,

仅使人饱食、暖衣、安居,就会使人沦为禽兽;所以“明人伦”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道义为本,就是施仁政。

大变革时代最需要的是确立社会核心价值观。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大变革时代,各国普遍追求富国强兵,周代所形成的“井田制”遭到破坏,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加之工商业的发展,“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利(商业)百倍”的比较优势成为巨大引力,“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成为基本的功利价值判断,从而促进了私有制的确立。这种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必然给人们带来新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也自然包括道德价值的选择。孔子和孟子都崇拜周代的井田制——田地排成一个“井”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是分给八户人家的私田;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井田制逐渐被瓦解,孔子所谓“复礼”自然包括恢复井田制,而孟子对于井田制的描述更是增加了一些理想化的成分。在《滕文公上》第三篇就有专述,核心是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田界开始,若田界划分不公正,井田面积就不平均,收的谷物就不公平。“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所以“仁政必自经界始”。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私有化所造成的土地兼并和商业利益所引起的逐利行为,会引起人伦之理的道德混乱。孔子不是以简单的说教来粉饰和传导西周礼乐制度,而是用理性的思辨为传统礼乐注入新的思想内容,要使礼乐服务于社会;也不是像原始的礼乐服务于鬼神,西周的礼乐服务于王权政治,而是要使礼乐深入人心,促进人伦道德以礼乐为标准不断深化和规范化,引导社会成员修身养性,塑造崇高的人格。孟子也不是简单的谈论仁政及性善,而是将仁政和性善建立在基本的人伦关系之上。他在大变革的时代看到了人皆有善的品质和禀赋,皆有为善的能力,但并非排除人性中包含恶在内的其他内容,即使为不善也不能否认人的善性的存在,正像孟子常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对此,张岱年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中认为:“孟子以为人之于禽兽,所异者不若所同者之多,说明孟子并不否认人有不善的性质即与禽兽相同的性质”,但问题在于孟子“又谓‘不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所谓性者,

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184—185页)。孟子正是抓住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才紧紧抓住了教化的关键即“人伦道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行义”(《孟子·离娄下》)。这不仅看到了人不同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而且看到了百姓丢掉了它,君子保存了它,正是舜明察事物、洞察人伦、顺着仁义而行,而不是照着仁义去做。这便是君子与庶民的区别。在孟子看来,“由仁行义”是仁义由内而外自觉地呈现和流露,而“行仁义”则是将仁义看作外在的对象而去实行它。所以,“由仁行义”是人伦道德自律,“行仁义”是人伦道德他律,人伦道德教化的理想目标是“由仁行义,而非行仁义也”。

在社会转型和大变革的今天,孟子深刻地把握大变革的时代特征和围绕王道与霸道、仁政与道义、性善与人伦而形成的诸如性善论、民贵君轻、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和王道之辨等思想,尤其是“皆所以明人伦”命题的提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迪。特别是在面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伦理”的缺失与个体主义的张扬、道德示范缺失与功利主义的膨胀、“倒”的伪讹与“扶”的委屈、逐富仇富与金钱至上、人际危机与欺诈浮华等非常态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思惟前圣。若没有孔孟前圣对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有关“礼制”和“明人伦”问题的思考以及儒学思想的建构,就没有中国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地位,就没有中华2000多年帝国时代的鼎盛和稳态。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仍然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对人伦道德文化思想的探究与建设。

记得黑格尔在他的遗著《德国唯心主义最初系统纲领》中曾经预言:“形而上学在未来将进入道德之域……而伦理学将成为一切理念的完整体系”,从而预示着道德、伦理将成为哲学的“普照之光”。岂不知早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和孟子,已经把道德和伦理作为了儒学的根基,“明人伦”的思想普照中国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是孔孟先哲的智慧。来自中国儒家的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人的愿望和行为先于认识,人必须学会并具有善的欲望和行为,才能将善作为善来认识,而这种善的欲望和行为又是建立在“人异于禽兽几希”的善性存在的价值基础上的;由于价值给予性又

是先于存在给予性的,所以在道德教化中的人伦价值给予性之所以先于人伦存在给予性;关键在于“父子有亲,夫妻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的人伦价值,而不仅仅是自在的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等的伦序存在。正是我国古代先哲们已经对认识与价值的关系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不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彻底地将认知奠基于道德的基础之上,把对人伦价值的认识建立在慈与孝、扶与服、友与恭、明与忠、诚与信等善的道德价值与道德规范相统一之上;而且通过建立以“智”为人的认识基础并将“智”与仁、义、礼、信一起并列为伦理“五常”,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中就将哲学融入道德之域,并逐渐构建起伦理道德的完整体系。

人伦之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哲学从来都是与时偕行的,从来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都脱离不开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明代“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曾经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说明圣人之言都与时代的社会生活甚至是百姓的日用常行密切相连,与后世议论儒学者所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认识完全不同。正因为圣人之言出自对百姓生活而又用于百姓生活,所以才总是同时给人以“微言大义”和“形而上学”之感,不仅孟子的思想总是离不开孟子对战国时代的思考,离不开战国时代百姓的生活;而且董仲舒的人伦纲常思想也离不开初创皇权或帝国时代及其百姓的生活,钦定《五经正义》也总是与帝国在唐代达到鼎盛所推动儒学发展相一致;尤其是随着宋代市民生活的出现而产生的现代性观念,历史地体现了由《五经》向《四书》的转型,在反映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中,促进了包括人伦观念形态在儒学经典系统中的转型;虽然“五四”的矛头直指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但毕竟程颐在释易谈天下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时,认为“人文,人之道也”,人伦之理就是人文的全部;“如何是道?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仍然保持了形而上学在人伦道德之域思辨的儒学传统;即便是明代的阳明心学与清代的乾嘉学派,其人性论和考据学,都与对晚明以来新的市民社会生活的思考分不开,都与如何选择、传承、批判、创新人伦之道分不开。所以,人伦思想、人伦德育总是在与时偕行的,我们完全应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审视和研究它。

从宋五好博士的《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著作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人伦思想同历史社会生活与时偕行,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人伦德育思想同历史社会生活与时偕行,从中认识、梳理、论证、阐述几千年来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的过程、理路和趋势,总结其历史的规律和现实的意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研究工作。她的研究智慧在于不纠缠于细枝末节,始终坚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紧紧抓住大的历史关节点和影响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的重要思想结点,以人伦德育的思想脉络为主线,把人伦思想与人伦道德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这项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她继《人伦与道德教育》专著之后,又呈现给学界一部文义深邃的著作。我知道她的研究十分不易,因为她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是在不住站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意味着她需要用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日常工作、生活与科研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哪一方面都没有理由放下,哪一项工作都不能耽误。她那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断攀登的精神与她所取得的成果一样值得称赞。

我曾经与五好博士谈过,走进一个研究领域不易,绝不是任何一个专注学术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走进一个等待开拓的领域;喜欢一个研究领域更不易,绝不是开展一些研究工作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喜欢上一个领域;把一个喜欢的研究领域当成事业来做尤其不易,绝不是一道梁、一座山就会当凌绝顶。当你攀上一个研究高度时,会发现还有更加美妙的无限风光在向你招手,只有笃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不断继续前行者,才能把心存的梦想变成现实高度。所以,在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完全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中国人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这个领域目前还是空白,权当以前的研究都是先期研究而已,老师会始终等着为由你亲自著出的《中国人伦思想史》作序,你始终不会缺少师大导师们阳光般的关注和期待。

谨此为序。

栗洪武

2015年11月5日

序 二

人伦德育是宋五好博士长期思索和研究的问题,《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是宋五好博士进入河南大学教育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所选择的研究课题,也是她在站期间继《人伦与道德教育》出版之后,又呈献给学界的一部新的著作。宋五好博士先是师从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国家督学、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栗洪武先生,进入人伦德育研究领域后,潜心攻读,深入思考,打下了坚实的教育科学研究基础,进入河南大学教育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之后更是“允执其中”,很好地保持了研究问题的连续性,虽然其间并没有脱离工作岗位,但还是凭着扎实的基础、自觉的意识和顽强的毅力,主持和完成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等重要课题,在 CSSCI 收录学术期刊发表 6 篇学术论文,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任务,出站后不到半年时间即对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充实和整理,完成了著作出版前的各项工作。在新著付梓之际,作为她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除了祝贺之外,也向学界予以特别推荐。

人伦德育既是教育学科研究的新领域,更是德育学科研究的新领域。人的道德生活不仅给人认识道德价值和建构道德理想提供真实体验,而且也给人认识世界提供真实体验。人们生活的世界并不仅仅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仅此是理论上才可以认识到的世界,那么绝大多数人就根本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何况理论上可以认识的世界是无止境的,人们只能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过程恰恰更多的是在生命体验的进程中所体验到的世界,认识活动在更多的意义上是生命体验而非理论上的“逻辑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体验正是通过生命体验而认识世界的重要发端。每个民族在进行基于生命体验的道德

体验中,会选择不同载体、形成不同方式和生成或建构不同的道德价值及其道德文化,但归根结底又都是以“善”为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归宿的。溯源中国道德文化的发展,对“人伦”的认识和道德规范的确立,是生命体验和道德教育的鲜明特点。“伦”在规定人的生命秩序中,由血缘之伦外推到社会之伦,无论是皇王帝伯、卿僚大夫、士人官吏,还是普通百姓,都在统一的“伦”中进行着包括道德体验在内的生命体验,并且按照不同的伦序关系履行着不同的道德责任和体验着不同的道德价值,做父亲的在父子之伦中尽着“慈”的道德责任,同时享受着来自子辈的“孝”道德精神体验,子辈同样在尽着“孝”的道德责任,享受着来自父辈的“慈”的道德体验。这样一来,夫扶妇服、兄友弟恭、君明臣忠、朋诚吾信,不仅完整地构成了道德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生命体验的基本图式,使所有人在伦常的生命体验中得到充分的道德生命愉悦,而且也完整地形成了由“慈”与“孝”和“友”与“恭”构成的“亲”、由“扶”与“服”构成的“别”或“和”、由“明”与“忠”构成的“义”、由“诚”与“信”构成的“情”等完全平衡的道德范式,使所有人都能在伦常的生命体验中获得“责任(义务)”与道德“回报”的真实感,加之历代儒家精英成功地将“仁”和“善”的精髓注入人伦思想、道德价值、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之中,使慈、孝、友、恭、和、亲、明、忠、义、诚、信等都有了非常丰富的释义和思想的归属,正是这样一个丰富的精神生活世界给人们提供的精彩的生命体验,经久不衰地构成了中国人伦文化的历史长卷。宋五好博士要做的就是要在中国人伦文化的历史长卷中梳理、研究其道德教育的学术价值。

教育实践呼吁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德育实践更是期盼德育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既不同于科学所研究的物质世界,也不是被科学所遮蔽的即运用科学方法所处理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由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所构成的真实的生活世界。中国传统人伦文化即人伦生活世界正是这样一种真实的生活世界,人们不仅在伦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尚往来,而且按照“父慈子孝、夫扶夫服、兄友弟恭、君明臣忠、朋诚吾信”等思维方式,选择道德行为方式,依伦尽分,而这种处理生活世界的哲学方法,也正是当代世界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胡塞尔所标榜的“只有用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才能够达到”的处理真实生活世界的方法,这是中国先哲们的

智慧,更是中国道德哲学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所在。在现实的德育实践中,我们过多的给道德思想、道德价值、道德信念、道德教育等冠以所谓的“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概念、科学方法”等,岂不知恰恰是以科学的名义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世界和真实的道德生活,尤其在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在生活世界的诸如人伦道德缺失、功利主义之上、重利轻义、道德示范主体缺位等道德文化危机的情况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寻求中国式的道德哲学方法拯救其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却正在渐渐疏远我们优秀的人伦文化,不能够珍惜先哲们创造和在悠久历史中与时偕行的人伦德育精粹。正是基于这一点,宋五好博士所进行的人伦德育研究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深刻性上,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价值。

人伦德育是一种让道德即“善”进入人的心灵的生命过程,是贯彻于人的整个生命的体验。因为人的完整生命过程都是在人伦中进行的,无论伦序对于个体生命过程而言发生什么样的由子到父、由幼到长、由下级到上级等线性的或由同学到同学、由同事到同事、由朋友到朋友等非线性的改变,不变的是建立在人伦之理之上的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所以,生命过程对于人伦道德的体验总是丰富和常新的,只有不断地让道德进入心灵,才能不断地巩固心灵的“善”。使人向善,引导人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始终是道德教育的呼唤,但我们在接受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的知识论的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单纯的道德知识和规则的灌输模式,使人成为脱离了情感的抽象物。我们呼唤道德教育进入人伦之中,其目的是通过人伦秩序而进入人的心灵。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中庸之道基础上的辩证思维,其“叩其两端,允执其中”的辩证关系,不仅拒斥主客二元分离,而且坚守复杂的辩证转化,各种伦序中的“慈与孝”“友与恭”“明与忠”等人伦道德关系,反映的并不是“父与子”“兄与弟”“长与幼”“君与臣”等二元分离的转化,而是“允执其中”的辩证转化,这种辩证转化的目的是为了在生命体验中使道德进入人的心灵,在道德价值支撑下体验有意义的生活。在人伦道德教育中,古代先哲始终认为人有“大体小体之别”,同样的人有的成为有德的大人,有人则成为无德的小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小体指“耳目之官”,大体则指“心之官”,“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不具有“思”的自主性,而“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具有自主性、能动性,通过“思”,反求诸己,发现“天之所与我的仁义礼智”,从而使入伦道德进入心灵,达到成人(大体之人)的道德教育目的。

宋五好博士是带着对人伦德育的充分思考而进入河南大学教育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首先以人伦价值在道德教育中的失落为逻辑起点,深入研究了人伦及人伦关系、人伦价值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论证和阐述了道德教育的人伦价值始点、文化传统中的人伦观、人伦价值在道德教育中的运行机制和道德教育中人伦价值的重构等问题,以著作《人伦与道德教育》作为先期研究成果,而后又通过对人伦思想的学术边界、人伦思想的发展脉络、人伦思想的形态演进、人伦德育思想的范式和人伦思想的时代视域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在系统反映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人伦思想尤其是人伦德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人伦文化传统中人们通过“伦”中的道德体验而感受生命体验和认识生活世界的规律,揭示了用人伦哲学处理生活世界的真理性所在,在博士后答辩中得到了所有专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宋五好博士的《中国人伦德育思想变迁研究》的出版是智慧与心血、勤于思索与勇于创新的结晶,作为她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期望她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坚信她在中国人伦思想的研究上会不断给学界带来新喜。

就在我为宋五好博士的著作作序的同时,宋五好博士当选为河南省教育学会教育学专业委员会新一届理事,值此一并祝贺。

是为序。

刘济良

2015年11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2)
第二节 研究现状	(10)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23)
第四节 研究价值与创新	(26)
第二章 人伦德育思想的学术边界	(28)
第一节 人伦德育概念界定	(28)
第二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31)
第三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心理基础	(34)
第四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文化本质	(38)
第五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运行机制	(46)
第三章 人伦德育思想的发展脉络	(54)
第一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本义化探索	(55)
第二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制度化发展	(82)
第三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革命化变革	(102)
第四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市场化际遇	(125)
第四章 人伦德育思想的形态演进	(137)
第一节 亲族德育形态:由仁行义,化民成俗	(137)
第二节 学校德育形态:以礼制心,之所以明人伦	(140)
第三节 社会德育形态:观乎人文,化成天下	(144)

第五章 人伦德育思想的范式转化	(147)
第一节 制度化人伦德育思想范式	(149)
第二节 非制度化人伦德育思想范式	(151)
第三节 制度化人伦德育思想范式与民间人伦德育范式的同 一性基础	(153)
第四节 价值认同:道德价值在制度化人伦德育范式与民间人 伦德育范式中的转化	(156)
第五节 示范认同:制度化人伦德育思想范式与民间人伦德育 思想范式的价值同构	(158)
第六章 人伦德育思想的时代视域	(163)
第一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伦理转换	(164)
第二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价值追寻	(171)
第三节 人伦德育思想的示范建构	(181)
结 语	(189)
参考文献	(192)
后 记	(202)